

740

D643

X57a

2002

时事**报**告音像版

2002 年第 3 期

— 赠刊 —



A0978664

总策划	曹绍平	闵凡路	
策 划	马立诚	肖 平	雷 颐
主 编	陶 军		
副主编	吴旭红		
总撰稿	马立诚		
VCD 责编	刘 浩		
文刊责编	王金柏	王瑞芳	
美术总监	梁 凯		
出版主管	刘金女		
发行主管	史国平		
发 行	张 杰	郑 颖	姚希燕
总 监 制	赖官宝	王新营	
出 品 人	王 满		
编辑制作	新华社音像新闻编辑部		
出 版	新华音像中心		

本刊头条

思想大解放（专题片解说）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 10 周年

2002 年，春天到来了。

在这个时刻，很自然地，多少人都想起了 10 年前那个春天的故事。从祖国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位老人的谈话，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震撼了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中，还回响着他南方谈话的声音。

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的改革开放的势头，持续了 10 年。

第一部分：十年惊变

邓小平：“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人民生活要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邓小平南方谈话彻底扭转了中国经济停滞徘徊的局面，催动了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经历了 1997 到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又经历了 2000 到 2001 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拖累，10 年来，中国经济仍

然一枝独秀，强劲增长，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左右。

南方谈话10年来，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

到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到2000年，随着第九个五年计划完成，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消除了贫困，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里程碑。

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充分证明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到2001年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冲击中，我国果断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了诸多困难，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

1998年夏季，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万众一心，夺取了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2000年，党的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拉开了中国西部现代化的序幕。

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结束了15年的漫漫入世路，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全

球化进程,同时也使我国经济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进程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圆了五环梦,显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成功举行,这是9·11事件之后世界范围首次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会议,表明我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2001年,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掀起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

2002年,我国“十五”计划开局良好,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着旺盛的活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奋斗伴随艰辛,成就来之不易。今天的辉煌,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来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拓的新境界。

第二部分：雪化冰融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富有远见的领袖,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旗帜,对事关党和国家前

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拨正航向，推动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继续前进。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一位“百分之百退下来”的老人的一席谈话，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谁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南方谈话为什么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前进中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事实上，从1989年下半年起，“左”的东西就抬头了。“左”的思潮在社会上滋长泛滥，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当时的社会舆论是什么样呢？

新华社《中国记者》杂志1990年5月号发表文章《光彩体育馆随想》。文章说：仅仅几个月，全国个体户就减少了360万。文章指出：“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部感到有点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户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无形中增加了这种不安的情绪。”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有个担心，说深圳搞特区，搞得是比较快，但是会不会搞资本主义，所以特区的姓资姓社，是一直争论不休的。”

这就是当时的动荡情绪。

各种传闻搅得人心忐忑不安。

有人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

有人批判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是帝国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一剂毒药；有些媒介还发表文章说：“计划经济不容否定”。1990年12月17日，北京某报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1991年3月15日，北京某报发表文章《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说：“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有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说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

人们注意到，当时，“左”的话语最集中的的口号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一些文章对经济改革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化的改革？”他们主张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并且强调说这是改革道路上两个方向、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些似曾相识的话语，使一些敏感的人不由得想起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很多人都觉得要搞新的政治运动了。在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在温州和泉州这

些民营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人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某省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用这样的语言形容当时干部群众的心态：“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

国民经济增长一直在4%左右徘徊，经济疲软使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头愁云紧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以88岁高龄，毅然南巡，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令中国人大感意外，实际上又在期盼之中的谈话，高屋建瓴，冲破“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重新启动，隆隆前进。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1992年他在1月19日到广东来视察，他多年没有来了，大概距离上一次是8年时间。他是1984年来过，这次来是8年后大家知道了小平同志要来是非常高兴的。我就觉得小平同志是急着要了解情况，急着要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变化，这一点印象很深了，因为原来没有这个安排，就是要休息一下嘛，然后再按计划一步步来，可他改变了，他马上就要看。”

邓小平：“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工作人员：“不会，不会，您放心”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从深圳参观，然后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他看的过程，他一边看就一边谈，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他整个过程都谈。他这个谈话不像老人的讲话，没有废话，没有重复的话，思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而且深入浅出，很精辟。”

工作人员：“现在这个产品已经进入国际市场。”

邓小平：“好，出把力，依靠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要摆脱落后被人欺悔的局面。”

邓小平：“所有出国去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过去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回来妥善地安排，他们能够做出贡献，只有回国，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在外国真正相信他们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手软不得，我也是在广州时谈到，人有两只手，这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经常强调，两手都硬，两只手，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一只手抓改革开放，一只手严厉对待那些坏东西，毫不手软，两只手都要硬，软一点都不行，软一点都搞不起来。”

邓小平：“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要开呀，开放了信息才灵通”

邓小平：“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邓小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

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资料片：“小平同志同杨尚昆同志与广东军区、广东省、新华社香港分社、深圳市的负责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合影。合影后，与同志们亲切交谈。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也没有。”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干扰，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资料片：“小平同志还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

许看，但要坚决地使；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特区的建设应该是我们的瑰宝，深圳特区大量地引进外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引进外资的比例中他占40%左右，国有企业，国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其中有一条，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小平同志还讲，连外资的部分还可以从各个方面我们还有我们股份，合资企业这里还有我们的利益。这个是社会主义政权调整下，引进外资发展各种经济成分，不会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另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你看他们的讲话中也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就是要冲破一些旧的对生产力发展不好的一改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我们的制度、办法。这个来讲，他也指出我们社会主义不但要有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我们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革命。所以他就提出，成为一个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就是进行各方面的大胆探索，三个方面的有利于，服从于发展生产力，这个讲得很清楚。

邓小平：“我是看新鲜，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越高兴。我高兴，人民高兴，还有中国这个国家高兴。”

邓小平：“要发达起来，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邓小平：“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吧。我们才多长时间。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们现在的面貌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

邓小平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我们不发展或者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南方谈话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真理标准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党中央作出建设改革实验地的一个过程，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地，第二句话就是以市场趋向为改革如果成功了，就说明邓小平的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走对了，他就把这里的实验向全国铺开了，恰恰是因为小平同志，因为在这里取得成功了，全部大体上也就是走这条路子，所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把实践的时间、特区的改革开放的实验的事件总结提高，上升为一种中国会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样一个认识。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就是说，慢慢地邓小平理论就比较完善了。所以这个作用南方谈话可以这样讲，属于不是小平同志适时地来南方进行考察，不是适时地总结深圳特区，其他经济特区或者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的一些经验，特别是积累经验，进行市场体制改革的试验，使得他能够在这里加工成为一种系统的一个东西，就是吸收中国可以大胆地搞市场经济。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也是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搞，这就是我们全国改革开放的浪潮。”

“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是标志着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庞元正：“对于南方谈话的意义，我想呢，概括为这样三点：第一它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

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政治宣言书；第二点它把我们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第三点它是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王怀超：“南巡谈话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是两句话，一个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表达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它的理论意义，它的实践意义，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邓小平发出的一个改革的呐喊。实际上在历史转折关头，拨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没有使改革开放的这个航向逆转，也没有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转入低潮的这个影响，也没有受到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一如既往，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推向现代化，那么再一个，第三个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中国掀起了第二轮改革潮，使中国的改革解决了困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要害问题，计划和市场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衡量事物的是非标准问题，什么姓社姓资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正是在南巡谈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步伐，如果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谈话，可能就没有这十年 1992 年到 2002 年，这 10 年的平稳发展，飞速发展。”

南方谈话发表后，在全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

美联社 1992 年 3 月 30 日的电讯说，邓小平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邓先生坦率地说，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人连常识都没有。他说中国应该选择能够发展自己的道

路，不用担心它们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日本《每日新闻》3月31日报道说：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特区时指示“加速改革开放”，激励领导人在经济上赶上“亚洲四小龙”，这正是一段时间被压抑了的中国改革者的心声。

路透社3月31日的电讯说，中央电视台用45分钟播放了邓小平1月份视察深圳的镜头。邓小平重新发起改革开放的势头，使中国再度充满生机，今晚的电视节目使这个势头达到高潮。

从那个春天起，中国经济增长和邓小平的名字更是被世界政要屡屡提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第一，因为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展幅度最大。第二，中国拥有十二亿人口，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中国毫无疑问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国之一。”

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阅读有关著作，注视着中国的一切。他（邓小平）经历了中国国内那么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并且幸存下来了，他领导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物质上的收获。通过几次对华访问，我看到中国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

塞浦路斯前总统瓦西里欧：“是他（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并且创造了我们有目共睹的经济奇迹。”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邓小平）有原则，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还把自己的原则投入到实践当

中。他是个实干家，他追随自己的目标，并且认为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相同的目的。那就是中国的强大、中国的统一、中国的稳定。”

荷兰前首相范·阿赫特：“他（邓小平）是我当时所见过的最风趣、最充满活力、最具魅力的人之一。我并不想充当预言家，但我当时我便认为，他是能改革中国，引导中国踏上新路程、新发展道路的人，而事实恰恰如此。”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要加速改革开放，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普通中国人的支持，肯定能使中国逐步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正是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

第三部分：春潮滚滚

邓小平南方谈话有如黄钟大吕，压倒“左”倾思潮的瓦釜之鸣。整个中国为之一振，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困境，浪潮重新奔涌起来。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报道了邓小平南巡谈话过程，这篇文章不胫而走，各省市报纸纷纷转载，人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

中央领导层动作迅速。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南方谈话以中央2号文件形式向全党下发。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南方谈话精神，就重大问题做出部署，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会议认为，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

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作为4号文件下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关键时刻视察南方，作了重要的谈话，谈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谈话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对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科学分析和深刻的总结。这次谈话，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以巨大推动。”

在加快改革方面，中央提出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快物资、商业体制改革，积极扩大国外市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的要求。

在扩大开放方面，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开放沿边城市，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加快内陆开放步伐，省会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扩大开放领域，拓宽利用外资形式等一系列决定。

上海的发展在邓小平的心中举足轻重。小平同志说过，上海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是邓小平对上海的期